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镇域“接点”的发展路径研究

——以芜湖市 T 镇莲子产业为例

高慎香

安徽师范大学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重视“三农”工作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有利效用的镇域是多元主体之间有效对话、协商交流的“接点”，基于 T 镇发展的现实情况，本文构建了环境——基础、结构——主导、枢纽——精英、保障——剩余劳动力等是促进镇域发展的重要途径。经过途径的运行镇域面貌焕然一新，但产业发展仍面临现实困境，需要从产业融合、科技创新引领、培育人才队伍、探索新联结机制等路径拓宽镇域发展的新渠道。

关键词：“接点” 乡村振兴 镇域发展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走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社会经济等各项子系统已迈入现代化之列，而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步伐依然缓慢。马克思提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这个有机整体的不同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只有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才能保证社会运行的协调性（郑杭生，2019），进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三农”问题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与时俱进的政策支持，尤其在 2017 年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根本上看，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当前“三农”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性问题，进而全面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的重大战略选择（郭晓鸣，2018）。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与农村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相统一，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旨在改善农村穷、乱、差的旧面貌，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李少惠、赵军义，2019）。乡村振兴是一个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

建设在内的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杜克捷，2020），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石，必将引起乡村各系统的有序调整。单线性的国家政策、单方向的资源汇入并不能有效的振兴乡村，战略、乡村、市场等应有共同协商交流的“接点”，使多元主体能够在一定“场域”中有效沟通，进而构建不同行动主体间长效对话的机制。围绕定点形成长久有效的“磁场”模式，从而持续性的发挥“输血”功能，最终提高乡村“造血”能力。这无疑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以农村产业融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导向，2017 年 T 镇开始发展籽莲产业并加大产业融合，现如今其发展情况如何？观察社会要用“从下往上看”的视角，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曹锦清，2001）。产业发展的好不好关键要看农民、农村是否满意，为解答此问题，于 2020 年 11 月在 T 镇进行调研。通过分析 T 镇籽莲产业融合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索完善 T 镇籽莲产业融合的路径，为推动 T 镇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思路，也为其他镇域经济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本文使用的材料等均来自对 T 镇村民的访谈内容。

一、现有研究回顾及研究缘起

关于镇域，林志明等认为是建制镇（或乡）的镇（乡）区及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地带，是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多要素耦合的复杂系统（李裕瑞、尹旭，2019）。采用此概念是因本研究强调乡镇地域的整体性，涉及建制镇镇区及行政村地域范围。镇域发展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学界的热点话题，主要有空间规划、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讨论。

学界对镇域规划的研究侧重空间规划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居民点空间规划研究。在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的规划视角下，镇域不再是独立的发展单元。若将镇域城镇、村庄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农田保护等规划统一纳入镇域总体规划，可使区域的宏观发展策略和意图在基层的计划中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吴效军，1998），构筑合理高效的城乡体系，以实现乡村建设的持续发展（赵之枫，2002）。镇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悖于生态发展理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打乱布局为成本，对内基于小城镇自然本底空间的基础划分若干适宜的生态分区，构成有机统一的小城镇生态系统（王敬华等，2002）；对外把犬牙交错、零乱分散的布局规划作空间整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朱介鸣，2009）。镇域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其优质的区位条件，如郑州都市区镇域经济空间格局总体

呈“轴带+市区”的空间扩散态势（丁志伟等，2013）；重庆市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受空间区位条件等差异的影响（李媛，李孝坤，2014）。而且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周边镇域经济与一般地区镇域经济在经济关联度等方面存在较明显差异（卢刚，2016）。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点的空间规划布局成为统筹城乡发展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分为低密度块状、低密度点状、高密度点状、高密度条带状4种类型（王焕等，2008）。在居民点用地方面呈现数量多、分布零散、利用粗放等问题，对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形成了束缚（谢炳庚，2010）。陈兴雷基于聚类分析把南汇地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分布分为远离中心类和集聚中心类两种类型（陈兴雷等，2011）。镇域有其独特的空间布局规划，但传统镇域规划实践体系和理论有不足，林志明等构建了镇域布局规划内容为研究和规划提供参考（林志明等，2014）。孔雪松通过点-轴空间综合作用分析与测算大冶市大箕铺镇，对不同空间布局以相异的优化模式进行空间引导与整合，实现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孔雪松等，2014）。叶艳姝等以江西省湖口县流泗镇为例，在对农居点建设发展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得出加权集覆盖模型的集聚发展型农居点选址明显更为合理（叶艳姝等，2017）。罗志军等基于多种空间分析结果和组合特征，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居民点类型的特点制定相应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为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点规划发展提供依据（罗志军等，2019）。

镇作为基层一级政府，直接对各村委会及村民提供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新中国成立以来，乡镇职能经历了3次演变历程，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依然是乡镇政府职能的重中之重（赵园园、戚小倩，2011），既是社会建设的重点难点，也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曾维和，2013）。面对社会转型，根据乡镇管理职能转变遇到的现实问题，乡镇管理职能调适的总体思路是转变到“扶、帮、助”的服务型管理（魏文章，2004）。有效推进村民自治（张凯，2006），有机地结合群众路线和农民参与，在自上而下的群众路线和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两股力量上取得平衡（方军，2012）。但我国乡镇社会管理系统出现了“内卷化”困境，为解决这一乡镇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供需矛盾，首先构建从“结构—环境—效果”三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管理的行为过程环节出发以对应创新乡镇社会管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曾维和，2013）。其次，学习成功乡镇的社会管理经验，如枫桥镇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具体作用（周鑫泽，2012）。再次，乡镇政府要在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乡镇工

作考核体制的基础上,变“压力型”体制为“动力型”体制(曲延春,2013)。积极探索乡镇善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变革与重构路径(蒲泽洪,张晨,2013),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李德虎,曾艳,2013)。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形势下,基层政府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主动及时地公开信息,借鉴国内外创新成功的案例,因地制宜地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并从自身角度出发,采取适当的变革措施,提高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能力(颜金,陈能华,2015)。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高园,2017年)。

镇域发挥着自上而下乡村振兴力量的推行与村庄内生力量发展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它既是连接各乡村的“中心点”,也是乡村互通互融的“辐射点”。王新民、李卫江较早论述了镇域若在空间上毗邻发达的开发区,可接受开发区的辐射和带动实现协调、联动发展(王新民,李卫江,2001)。除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近邻优势外,促进以传统农业为主的镇域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产业发展中的农业产业化,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黄伙有,2005)。在中国国情下,镇域经济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在发展中面临资金制约、建设步伐缓慢、生产技术配套能力差等问题,一方面通过创新发展思路、完善基础设施等对策解决(祝艳,2006);另一方面借鉴江苏省镇域盘活存量、筑巢引凤、政府扶持等有效措施壮大民营经济促进镇域发展(姬和平,2006)。镇域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镇域经济是提升县域经济活力的关键环节,因其是以集镇为中心,乡村经济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区域性经济体系(李建奇,2007);镇域经济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是壮大县域经济总量,提升县域竞争力的关键环节(魏后凯,2010);镇域经济是以集镇为中心、乡村为基础的多层次区域性经济体系,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郝玉龙、张华展,2011)。镇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动力是产业基础,产业发展已成为重庆市镇域经济较强竞争力的一个非充分却是必要条件(王燕飞等,2015)。镇域经济是具有综合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的经济体系(李裕瑞、尹旭,2019),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作用。必须发挥好这一“定点”作用,致力于衔接国家政策与乡村社会,在此基础上推动各村庄的内生力量发展,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推行镇域发展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的转型。

镇域发展是空间、管理、经济等多元化发展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产物。学界对镇域发展的关注仅关注一点或两点讨论略显不完善，只有三个方面共同助力才可形成镇域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尝试用调研的 T 镇融合三方面以解释该镇的发展。T 镇在 13 个行政村中合理规划荷莲的种植面积，靠近主要旅游景点的香湖岛主要种植品种、数量多的观赏类莲花为主；而承包户偏远主要景点，以经济效益为主种植可售卖的荷莲。荷莲的种植需要 T 镇政府的扶持与社会管理，为其保驾护航。最后，荷莲的种植形成以籽莲产业为主的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镇域经济的发展。镇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桥梁，是吸纳农村重要劳动力的蓄水池（何勇等，2014）。而镇域经济的壮大更多依靠的是产业结构的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镇域更要发挥“搭桥”作用。

二、镇域“接点”发展路径分析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由于中国区域差距巨大，虽然中央制定了乡村振兴的总基调，但是不同地方仍然需要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节奏进行因地制宜的乡村振兴探索（叶敏、张海晨，2019）。为此特别强调要以各地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为基础，有序开发优势特色资源，做大做强优势特色产业¹，培育农业产业强镇，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镇域作为“接点”上承政策下达的县级政府，下接各个行政村，既是政策执行的“接力棒”，又是乡村振兴效益反馈的“折射镜”，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1. 构成“接点”发展的环境：镇域发展的基础

如何依托自有环境在产业上下功夫，因地制宜发展支柱性产业，对镇域发展与乡村振兴至关重要。T 镇地处安徽省芜湖市湾址区，位于芜湖市的东南部，湾址区的西南部，青弋江流经。T 镇历史悠久，为北宋年间的四大官圩之一，号称“铁圩”，是罕见的人工开挖的水利工程。镇内沟沟相通，渠渠相连，十纵十横，河网密集，交通便利。该镇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自古盛产荷莲、鱼虾等。但随着人们的生产，种荷的传统已消失殆尽。90 年代初，在该镇的香湖岛周围零星出现莲花的种植，随着种植范围的扩大、品种的增多，以赏花为主的游客逐渐被吸引到此地。芜湖县十景之一包括“陶莘水韵”，在介绍水韵的资料上明确

表达其特点为“迷人的荷花，可口的莲子”。遵循这一传统禀赋，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文化底蕴以满足游客的精神需求，T镇乘传统、位置之风，破产业发展之困，保留“底色”传统再造镇域新面貌。T镇原以种植水稻为主，对所经营的事业采取的是一种经验式的方法²。莲子作为新型产业“刚开始种植的时候肯定不愿意，因为不懂啊，不像水稻还可以卖。谁也不知道这个产业好不好，试失败又不行”。农业具有天然的弱质性，随着新时期乡村振兴的进程，政府对农业进行适度的支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农业支持政策需要因时制宜进行调整（罗屹，武拉平，2020）。“一个新的产品没有政府推广和支持没人敢种。所以是由政府主导，给你补贴，一亩地 120。种莲子也有补贴，第一年是 500，第二年是 400，第三年以后呢，党委政府在拿出方案，再怎么讲。”政府主导加之优良的政策调控是农民接受新型产业的“定心丸”，“刚开始第一年种植的时候没有担心过赚不到钱，因为是政府支持啊，政府的钱也是国家的钱啊，镇政府领导重视，我们就不担心。”适宜的环境基础是镇域发展的“加速器”，可以助推产业的成长，尤其是新型产业的“扎根落户”。

2. 调整“接点”发展的结构：镇域发展的主导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最基本的内容，在农村经济社会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进程中，乡村产业到了再度振兴繁荣、兴旺发达的重要关口（张红宇，2018）。T镇在优势环境的基础上种植籽莲，而后调整籽莲产业结构，深化融合一二三产业，成为该镇域发展的主导。事实上，农村产业兴旺的关键就是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道路（罗士轩，2019）。一产指籽莲的种植、油菜的试种和鱼类的养殖。T镇从 2017 年推广籽莲的种植，现已累积 2 万亩，覆盖 13 个行政村，包含莲子与莲花两部分收益。2019 年，该镇成功示范“油菜+籽莲”种植轮作模式，在种莲之前播撒油菜，每年清明节时期油菜成熟再接续莲子。不至一年一作减少种莲户的收益，也使土地得到合理利用。莲子的种植附加出藕带的经济效益，4 月份时拔出藕带³出售到市场增加种莲户的收入。另外，部分农户采用“籽莲+养殖”的共生模式以增加收益，在莲田中投放鱼、虾、黄鳝、鳖等。在轮作与共生模式的发展下，农户一亩地纯收入在 1000-4000 左右，明显改善了第一产业的收入效益；二产指 T 镇招商引资的莲子加工厂。2017 年该镇开始招商引资，建设莲子加工厂，现拥有规模莲子加工企业一家，莲子加工点三家，基本能满足镇域莲子加工的需要，利用机器把莲子抽芯、烘干。“开花以后 15 天左右叫水果莲，是

最嫩、口感最好的莲子；开花 22 天左右来不及采摘的莲子会有花纹，这叫花莲，是用来烘干、通芯、加工的。再老一点的莲子，叫铁莲，出售到外地加工。”⁴把加工后的莲子以线下为主、线上为辅的方式销往全国各地，同时与“同福碗粥集团”合作，为其提供莲子原料。特色产业有着独特的优质性、优越的市场导向性和强烈的地域性，是提高小城镇综合实力的重要力量（陈晓蓁，2017）。三产指由籽莲产业带动镇域旅游业的发展。籽莲的种植极大的改善了镇域的生态环境，为旅游业的发展添笔加彩。“我们镇是 4A 级景区，得靠荷花支撑。再者，环境作用非常明显，荷花是水生植物，可以做到水体的自我修复，可以缓解水的污染，净化水池。现在的水质保持的很好莲子，常年达三类水质以上。有不少老百姓 7 月份回来，感觉自己家就像个大花园⁵”。真正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

3. 引领“接点”发展的枢纽：镇域发展的精英

在乡村衰落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需要乡村精英发挥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吸纳整合社会资源、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刘伟，彭琪，2020）。乡村精英即指个体能力强且能够在村民中发挥影响的那部分村民，他们大都拥有优势资源、成功经历和社会影响力（李云新，阮皓雅，2018）。T 镇籽莲产业的倡导者是当地中学的体育老师，他自己是荷花热爱者，之前在家就已种植品种较多的荷花。“我们中学有个老师，专门搞这个，董老师嘛，他的经验好。”随着同 T 镇周围的荷花爱好者紧密的交流，便形成了他人不具备的优势网络资源，进而在荷花种植与籽莲产业发展方面做资源及技术上的支持。2002 年左右，在 DHM 的建议下“政府开始恢复荷花建设，作为乡村旅游的抓手，当时的荷花主要是种花、看花为主，莲子为辅。我们虽然拿了不少牌子，但群众参与度不高，没有经济效应，为了种花而种花。”随后，2017 年该镇政府通过多次会议决定大力发展籽莲产业，DHM 以种植荷花的经历为基础向武汉等地学习种莲技术再传授给种莲户。如今，荷莲种植近 2 万亩，覆盖 13 个行政村。内生整合是指来自镇域内部发展的已有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外部嵌入是指将主要来自镇域外部发展的管理、技术等要素进入镇域。连接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的关键媒介在于镇域精英所占据的结构洞位置，不仅是乡村社会内部人际关系、人员组织、村务自治的关键节点，也是乡村社会与外部世界政策、信息、资源等汇集和调配的关键节点。

4. 助力“接点”发展的保障：镇域发展的剩余劳动力

“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民问题，相较于土地、资本、技术等因素，劳动力因素是核心和焦点（王成利，2018）。⁶在乡村剩余劳动力大多由于年龄、健康等被城市工业化“抛弃”，而高素质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的背景下，乡村振兴、镇域发展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乡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开发利用。如何挖掘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潜力问题从根本上关系着镇域发展。该镇“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都是50几岁，60几岁，小70岁的人。50多岁的人在家种植荷花，60多岁的人在家采莲子，70多岁的人在家薄莲子，剩下的30-40岁的人在外面务工，20岁的人在外面求学。”⁷“村里的年轻人在家的不多，这个年轻人不干，中老年人干的比较多。基本上年轻人打工在外面，都是50多岁以上的人。”⁸T镇充分挖掘剩余人口红利，对助力镇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应对劳动力的缺失并保障镇域产业发展的劳动供给，镇域老年人劳动力群体的作用不可忽视。镇域剩余劳动力的发挥在本质上遵循的是一种内源式发展路径，这种内源式发展强调了乡村的发展主体地位，注重对内部资源的利用（渠鲲飞，左停，2019）。

三、镇域“接点”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

1. 农业产业链短，产业融合度低

农业产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黄思，2020），种植、加工、销售、物流等产业链中，现只有种植链是最长且完整的。产业发展若限于某一特定环节必然压缩利润空间，提高种植成本。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本质是传统农业的升级和改造（蒋和平等，2020），镇域发展虽取得可喜成绩，但产业融合度仍不高。相对于工商业而言，农业投入多回报少，且相对收益较低。加之天气的不稳定、生命周期长等原因，产量具有不确定性等特点，农业面临的风险较大，降低大额投资的动力。一产同二产只是在镇域空间中毗邻拼凑，采用粗放式加工的方式简单合作，融合质量较低，二产规模小，往往因加工设备与技术不相适宜的原因破损农产品，附加值低，产业链短。本地缺乏市场主导权，市场与产品销售主要在外地，导致压价现象出现从而损害种莲户的利益，负贡献于农民可持续的稳定增收。以荷莲为中心的水韵风景观赏的三产比较单调，与之相应的产业开发不足。带给游客的体验感差，对镇域文化的挖掘仅停留在“了解”层面，旅游功能拓展程度不够深。

2. 机械化程度低，科技创新不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现代产业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对镇域产业来讲更不为例。从2004年-202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2004年提出“加快

科技进步”、2005年强调“以推进科技进步为支撑”、2007年提出“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提高机械化水平”、2012年文件突出强调部署农业科技创新，把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重点。随着国家对农业科技化的重视，农产品的机械化程度有了较大提升，但与荷兰等国家相比，农产品机械化程度仍然较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依然不足，尤其在小众农产品方面更显欠缺。具体而言，农机研发主体缺少。莲子加工是特色小众产品，“大的农机企业不愿意投入和研发，成本比较高，即使投入研发，用量比较少。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干这个事。现在那些机器都是农机爱好者研发的”。⁹站在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基础上，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因此研发农机的意愿较低、动力不足；此外，农业科技创新与生产效益转换衔接不当，科技链与产业链衔接不匹配，创新成果利用率低，没有形成有效的转化机制（李晓乐，2018）。因莲子地域性、独特性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3. 新型农人缺失，人才流失严重

费孝通曾指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规模向城市单线性流动实则反应的是镇域人才的外流，他们是发展的中坚力量，直接影响镇域发展的前景。由于在镇域无法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城乡公共服务有较大差距等原因致使他们单向流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老百姓我们也搞培训，现在种田的人年纪比较大。我们自古就种植荷花，我们即使推广，他们也不听。往往一些老百姓受到损失，搞的好的还好，有销售渠道的也还好”。留在本地的大部分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型农人，虽可挖掘他们的劳动力，但农业发展进入新时代，T镇莲子产业的发展更是需要懂现代农业种植知识与技术、农业经营与产品营销的复合型新农人。现农人表现出的特点是基数大、农业理论不够、思想重视不足、观念保守、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有限等，比较影响镇域产业发展的前景。

4. 龙头企业缺失，引领作用欠优

龙头企业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中坚和引擎，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骨干（姜长云，2019）。龙头企业对T镇产业的参与主要表现在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阶段，在产品种子出售、机械化使用、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等方面推动产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在延长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种莲户收益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T镇龙头企业“老总呢已经坐牢了，刑拘了，他为什么刑

拘呢，不是我们创造莲子的原因，他以前公司是国家开税，他在税上面偷税漏税，现在他老婆在干，所以给我们今年的产业呢带了一定的下滑，市场收购这一块不理想。这个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现在虽然有个企业重新接盘，但是资金链不够”¹⁰。后续招商的龙头企业资金链短缺，引领后发力不足，影响后期一二三产业的发展与融合，更是损害、打击农户的直接经济效益与对新型产业的信心。“去年还可以，去年大凌公司没倒，统一它全收，莲子要贵好多，今年是私人收的，要便宜。明年看政府怎么讲，再是这么便宜就不种了”。¹¹以家庭农场为主的种植户因其有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主要从事和负责种植功能。龙头企业的缺失提高了种植成本，种莲户的效益降低。

四、推动镇域“接点”发展路径分析

1. 构建农业产业体系，通过产业融合路径推动镇域发展

“三产融合”，指农业内部各部门、农业与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通过相互间的融合渗透、交叉重组等方式形成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型农业组织方式和过程，关键和核心在“融合”（肖卫东，杜志雄，2019）。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秉持新理念，不断转变发展方式，拓宽增收渠道（高元武，2020）。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但农业精深加工不足、产业链条短、农业质量效益不高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韩长赋，2020）。镇域产业在初步发展阶段时尤其需要政府的扶持，乡镇政府在发挥治理的职能角色中，落实各项支持产业融合的政策是首要任务。立足镇域生态优势、传统文化优势、以融合的的思路拓宽产业渠道，标新产业元素，立异创意特点。依靠合作社降低一产、二产交易的成本与信息风险，在一二产主体间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保护一产的特殊功能是三产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跳出农业发展农业、加工业发展加工业、旅游业发展旅游业的恶性循环模式，推动一二三全产业链融合、农产品附加值提升。围绕农产品积极开发三产的内涵、外延可发展领域，促进三产交叉融合、多元化发展。

2. 发挥科技引领作用，通过科技创新路径催化镇域发展

面对镇域剩余劳动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的境况，引发了农业劳动力弱质化和结构性短缺等问题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压力，农业机械化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环节机械作业替代人工作业，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薛超等，2020）。科技创新是乡村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乡村产业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李玉双，邓彬，2018）。首先，实现乡村产业的科技创新，关键在于

激发科研主体，整合企业、科研部门、民间等各种力量，加大对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推行因技制宜的奖励政策。综合各主体的科技创新资源，完善农产品技术体系并加以推广。善用民间力量，促进私人资本、时间、精力的投入；其次，加速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转变创新思路，以产品需求为导向，加强农业科技需求与实际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着力破解科技链与产业链之间的巨大瓶颈；再次，培养一批高质量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以农业科技企业为核心，不断吸引高质量优秀人才到农村创新，提高农产品科技贡献质量。最后，建立创新协同机制。推动产、学、研相融合，打破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促进创新资源流动与共享。

3. 培育镇域人才队伍，通过造就农经人才接班振兴镇域

城乡各方面的差距让城市自然的吸引优秀人才，镇域限于地域、传统等天然特征对外来人才吸引力不大，因此要着重培育本地人才队伍。人才是发展农业经济的第一资源、乡村振兴的接班人、镇域发展的主体。打造乡村人才队伍，就是为乡村振兴播下能够形成星火燎原式乡村繁荣局面的种子（刘合光，2018）。一是加强乡镇、乡村等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发挥好组织的带动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建家乡建设中。二是对早已掌握一部分种植知识、思维比较活跃、视野比较开阔、会经营、乐于服务他人的“土专家”，应通过教育途径加以引导和培育，激发主体能动性，加快专业技能的教导。三是激励城市优秀人才、大学生、外出务工者在乡创新创业，为产业发展播撒未来人才种子。加大相关农业学科的补助，鼓励各类人才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专业同乡村产业发展结合。四是打造镇域科技、信息等互联网技术人才队伍。利用网络掌握现代科技成果，在信息浪潮中找寻高质量、新思路、新商机促进镇域的全面发展。

4. 探索新的联结机制，通过构建产业联合带动镇域发展

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及产业融合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新的联结机制，如何构建高质量的产业联合体。第一，坚持镇域本地农民的主体地位。尤其是留乡务农者是产业获益的直接能动者，必须保障农民获得产业效益的根本权益。在顺应民意愿、尊重农民利益的前提条件下，激发农民与合作社、龙头企业合作的积极性，在三者之间构建产业效益联合体。第二，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在不断完善“企业+农户”的机制下，依托互联网平台创新“农户+”模式，在多个主体间构建分工明确、信息共享、风险同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第三，为构建产业联合切实推进放管服政策。任何产业模式的发展都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予以支持，唯有

此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农产业时既可做到对资本的依法监督，又可使农户对趋利本性敏感的资本安心。

五、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就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再次明确了“三农”问题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张玉强, 张雷, 2019）。镇域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以下意义：

一是促进乡村内源式发展。如果说自上而下的单线性整村推进、大规模的村庄整合与和村并居中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那么片面的政府主导只会使乡村振兴陷入内卷化的模式困境。如此，镇域作为“接点”的实践可催生乡村内生型力量，内生型力量培育出的内源式发展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本质脉络。分散化的乡村与原子化的村民如果无法参与到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并不能最大限度的提高乡村发展的实效，形成“自我导向式”的发展。

二是依托镇域打造乡村“一村一品”。“一村一品”模式要求以村为基本单位，全村实现一个或多个主导产品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需要协调众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孙娟、李艳军, 2014）。从总体上看，当前乡村的自然资源富足，资源同质性强，但是存在资源浪费，利用率低效的状况（秦晶, 2019）。乡村资源整合的重要主体是与其最紧密的乡镇政府，尽管不同乡村在资源、环境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但镇域可以充分整合现存资源，协调多元个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品”的选择上加以考虑地区的资源环境特色，因地制宜的在各乡村打造主导产品。

三是整合“空心村”资源。“空心村”是村庄空心化特征的固化（张贵友, 2019），人口的“空心化”导致村庄土地“空废化”现象严重，“空心村”的存在更是严重浪费现有土地资源。镇域作为“接点”有重新关联城乡关系的纽带作用，与邻近地区形成自然要素和经济要素的链接与互补，构筑范围更广的伙伴关系网，形成区域资源更加齐备的“共生圈”（张志敏, 2019）。乡镇政府要领全局并发挥主导作用，镇域范围是一个巨大的熟人关系网络，可以充分挖掘本土资本和社会网络，整合已有资源而不是引入外来资源（胡思洋、梁飞, 2019）。四是盘活镇域剩余劳动力。既然镇域发展是在乡镇区域内所进行的发展模式，那么其所依赖的劳动力必然来自镇域地区，对于外来劳动力的吸引并不强。而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留在乡村的实质劳动力减少，因此有必要合理发挥剩余劳动红利。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中国农村发展的“两驾马车”

之一（余戎、王雅鹏，2020）。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分析了镇域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接点”力量的发展路径、面临的现实困境及分析对策。乡村振兴的实现不能大拆大建、一步登天，更不能不顾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是镇域发展的现实基础，而政策环境的支持对于镇域新型产业而言无疑是锦上添花；产业兴旺是镇域发展的主导，调整产业结构、融合一二三产是加速镇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精英是一片地区的领军人物，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凭借其优势资源、成功经历和社会影响力促进镇域产业的发展；城市由于公共服务能力、劳动工资等优于乡镇，使劳动力大量流失到城市，而产业的发展、乡村的振兴离不开劳动力资源，剩余劳动力便成为镇域发展的保障。虽集中各主体资源共同繁荣，但仍面临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附加值低、机械化程度低新型农人欠缺、龙头企业缺失等现实困境。镇域可化被动为主动，积极构建产业体系，通过科技发挥引领作用，培育一批“土专家”，积极探索新的产业联合机制。

参考文献：

- [1] 曹锦清. 2001.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M].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
- [2] 陈兴雷, 郭忠兴, 刘小红, 李勤奋. 2011, 30(03):117-122. 大城市边缘区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对上海南汇地区的考察[J]. 地域研究与开发.
- [3] 丁志伟, 张改素, 王发曾. 2013, 33(07):29-35. 郑州都市区镇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 经济地理.
- [4] 杜克捷. 2020(20):89-90.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 [5] 费孝通. 2002.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商务印书馆, 北京.
- [6] 方军. 2012(02):204-208. 乡镇政府社会管理路径创新：群众路线和农民参与相结合[J]. 甘肃社会科学.
- [7] 高园. 2017(33):78-79. 为什么要强化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J]. 人民论坛.
- [8] 高元武. 2020, 38(03):46-55. 武陵山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基

-
- 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走马镇的调查[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9] 黄伙有. 2005(39):80. 镇域经济:特色就是竞争力[J]. 瞭望新闻周刊.
- [10] 郝玉龙, 张华展. 2011(05):55-56 城乡统筹的镇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 宏观经济管理.
- [11] 何勇, 陈新光, 崔文成. 2014(19):10-12. 加快我国镇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思考[J]. 当代经济.
- [12] 郭晓鸣. 2018(01):64-65. 为什么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 四川党的建设.
- [13] 胡思洋, 梁飞. 2019, 32(03):52-59. 空心化、“三土资本”与乡村振兴[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 [14] 黄思. 2020, 20(03):26-33.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振兴路径研究——基于一个药材专业市场的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5] 韩长赋. 2020(10):12-1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J]. 智慧中国.
- [16] 姬和平. 2006(06):16-17. 加快镇域民营经济发展——对洪泽县东双沟镇民营企业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 领导科学.
- [17] 姜长云. 2019(06):24-27. 龙头企业的引领和中坚作用不可替代[J]. 农业经济与管理.
- [18] 蒋和平, 郭超然, 蒋黎. 2020(01):5-14.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业产业的发展思路与政策建议[J]. 农业经济与管理.
- [19] 孔雪松, 金璐璐, 郗昱, 张怡然, 徐媛. 2014, 30(08):192-200. 基于点轴理论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J]. 农业工程学报.
- [20] 李建奇. 2007(23):7363+7365. 论农业产业化在镇域经济中的作用——以山东省菏泽市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
- [21] 李德虎, 曾艳. 2013, (03):33-38.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探析[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2] 李媛, 李孝坤. 2014, 31(02):35-39. 重庆市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23] 林志明, 张瑞霞, 汤品森, 李松平. 2014, 30(09):94-99. 全域视角下的镇域村镇布局规划编制探讨[J]. 规划师.
- [24] 卢刚. 2016(19):91-93. 大城市周边镇域经济发展模式探究[J]. 人民论坛.
- [25] 刘合光. 2018, 39(03):25-33. 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点、发展路径与风险规避[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26] 李云新, 阮皓雅. 2018, 17(05):117-125.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7] 李玉双, 邓彬. 2018, 31(06):159-165. 我国乡村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 湖湘论坛.
- [28] 李晓乐. 2018(29):60-61. 努力突破农业科技创新瓶颈[J]. 人民论坛.
- [29] 罗士轩. 2019, 12(01):119-127.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的方向与路径[J].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 [30] 罗志军, 赵越, 李雅婷, 林晓霞, 宋聚, 袁豪. 2019, 35(04):265-272+314. 基于空间组合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J]. 农业工程学报.
- [31] 李少惠, 赵军义. 2019(05):209-214. 乡村文化振兴的角色演进及其实践转向——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分析[J]. 甘肃社会科学.
- [32] 李裕瑞, 尹旭., 2019, 39(07):1-8. 镇域发展研究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
- [33] 刘伟, 彭琪. 2020(11):133-138. 结构洞理论视角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振兴[J]. 江汉论坛.
- [34] 农业部课题组, 张红宇. 2018(02):51-58. 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及实现路径[J]. 求索.
- [35] 蒲泽洪, 张晨. 2013(26):62-64. “乡镇善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再探究——基于乡镇党委书记的抽样分析[J]. 人民论坛.
- [36] 曲延春. 2013, 34(05):109-112. 从“政权经营者”到“社会治理者”——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的乡镇政府[J]. 东岳论丛.
- [37] 秦晶., 2019, 21(06):139-144. 乡村振兴进程中资源整合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 [38] 渠鲲飞, 左停. 2019, 45(01):55-61+194. 乡村振兴的内源式建设路径研究——基于村社理性的视角[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39] 孙娟, 李艳军., 2014, 53(22):5575-5579. “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发展概况与对策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道为例[J]. 湖北农业科学.
- [40] 王新民, 李卫江., 2001(08):15-16. 浦东孙桥现代农业园区与镇域经济协调发展探讨[J]. 农业经济.
- [41] 吴效军. 1998(05):3-5. 探索建立区域整体协同发展的规划控制体系——以浙北杭嘉湖城镇密集区城市湖州市为例[J]. 城市规划.

-
- [42] 王敬华, 乔忠, 刘革. 2002(04):122-125. 小城镇镇域生态功能分区规划浅析——以鹿泉市大河镇为例[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
- [43] 魏文章. 2004(12):11-13. 关于乡镇管理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J]. 理论导刊.
- [43] 王焕, 徐逸伦, 魏宗财. 2008(01):68-73. 农村居民点空间模式调整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 热带地理.
- [44] 魏后凯. 2010(02):80-86+238-239. 我国镇域经济科学发展研究[J]. 江海学刊.
- [45] 王燕飞, 林建, 雷隽娟. 2015, 21(06):51-59. 镇域经济竞争力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46] 王成利. 2018, 39(12):148-156.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劳动力政策演进研究——涉农中央“一号文件”的视角[J]. 东岳论丛.
- [47] 谢炳庚, 曾晓妹, 李晓青, 邓楚雄, 朱东国. 2010, 30(10):1700-1705. 乡镇土地利用规划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衡南县廖田镇为例[J]. 经济地理.
- [48] 肖卫东, 杜志雄. 2019, 19(06):120-129.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49] 薛超, 史雪阳, 周宏. 2020(10):87-102. 农业机械化对种植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路径研究[J]. 农业技术经济.
- [50] 叶艳妹, 张晓滨, 林琼, 林凡凡., 2017, 37(05):140-148. 基于加权集覆盖模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以流泗镇为例[J]. 经济地理.
- [51] 颜金, 陈能华., 2015, 38(02):34-37 基层政府社会管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以X镇为例[J]. 学术论坛.
- [52] 叶艳妹, 张晓滨, 林琼, 林凡凡. 2017, 37(05):140-148. 基于加权集覆盖模型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以流泗镇为例[J]. 经济地理.
- [53] 赵之枫. 2002(05):21-25+16. 以区域整体发展原则促进乡村建设的持续发展[J]. 城市发展研究.
- [54] 张凯. 2006(05):93-96. 破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性障碍——基于县乡(镇)村管理体制改革的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
- [55] 祝艳. 2006(10):37. 加快镇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J]. 理论学习.
- 朱介鸣. 2009(01):18-22. 发展规划的实证分析——论强化规划塑造城市的机制[J]. 城市规划学刊.
- [56] 赵园园, 戚小倩. 2011, 18(02):48-53. 强化乡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探讨[J]. 行

政论坛.

[57] 周鑫泽. 2012, 28(01):12-18.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浙江省枫桥镇的实证研究[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58] 曾维和. 2013(04):33-41. 创新乡镇社会管理:一个复杂系统的分析框架[J]. 社会科学.

[59] 郑杭生. 2019:61. 社会学概论新修[M]. 第五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60] 张玉强, 张雷. 2019, 21(05):497-504 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上海市 Y 村的案例考察[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1] 张贵友. 2019(05):37-42. 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治理对策研究——基于安徽省的调查[J]. 江淮论坛.

[62] 张志敏. 2019(04):98-105. 乡村振兴背景下空心村的形成与复兴路径研究——以 Z 省 S 县陈村为例[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63] 余戎, 王雅鹏. 2020(05):86-87. 以“三大改革”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J]. 人民论坛, 2020(05):86-87.

[64] 叶敏, 张海晨. 2019, 19(05):33-40+155. 紧密型城乡关系与大都市郊区的乡村振兴形态——对上海城乡关系与乡村振兴经验的解读与思考[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